

开放之城 老街延续的城市文脉

在中国城市历史上,天津属于晚近发展起来的城市。

商周以降,中原政权的核心地区一直稳定在黄河流域;魏晋南北朝之后,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乃至中国的经济重心,逐渐向江淮及岭南地区转移。唐宋以降,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再次发生改变——华北地区的燕山平原一带,渐渐代替了黄河流域,成为稳定和统一中国的冲要。哪个政权能够取得这一地区的中心,哪个政权就有条件稳定南北、统一中国。所以,伴随着历史的发展,中国政权的心脏部位,开始由黄河流域,移向了燕山平原。

金王朝在灭辽伐宋中逐渐强势,海陵王完颜亮于1153年把燕京定为“中都”,即国都。由于燕山平原不是当时的基本经济区,粮食及各种物资只好通过隋王朝开凿的永济渠,自江淮运抵涿郡(治今北京西南),再走陆路转抵中都。不久,因运河淤塞,金章宗完颜璟遂于13世纪初将永济渠自独流改道北上,在今杨柳青东折;潞河自河西务南延,同至“信安海澳”,与今海河源头“丁”字相交,形成了以三岔河口为中心的內河港——“直沽港”。为保障港区的安全,大约于1214年,在这里设立了“直沽寨”,派兵戍守,从而奠定了天津城市的基础。

从1153年到1214年,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差,可视为北京和天津关系的生动反映——没有北京建都,便不会有天津出现;没有天津作为北京的外港、出海口、粮食储备基地与东大门,首都功能的正常运行就无法得到保障。

1271年,忽必烈改国号为元,次年定都“中都”,并改名“大都”。为保障大都供给,首先恢复了大运河全线通航;不久又因运河淤塞,实施海运。但无论河运还是海运,漕船在进入河身窄、河床浅的北运河前,均须在直沽换载平底驳船;地处三岔河口的直沽港区,遂成为漕船换驳最集中的枢纽,“晓日三叉口,连樯集万艘”。附近的南运河南岸估衣街与海河西岸,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官南和官北大街,很快发展成繁忙的码头和集市,依河傍海的天津城市开始形成。

明朝永乐初年,朱棣以直沽为“海运商舶往来之中”,设卫筑城,并赐名天津。

由于“卫”是军事建置,没有辖境,管理范围只限天津、德州间运河两岸的屯庄。为不影响直沽港区的发展,卫城修筑时采取了“局部封闭”的原则,对于已经形成的港区城市平面来说,依然是面向运河、面向海河的“总体敞开”。

因此,天津城市的特点是“先市后城”和“市在城外”;靠近运河与海河的港区“百货交集”“商贾辐辏,骈填逼侧”,不但普通居民“万灶沿河而居”,就连“素封巨室”也是“率萃河干”。“卫”城只能修筑在市廛之侧,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天津在中国城市历史上开放型“无城垣城市”的属性。

清代天津,先是改卫为州,旋即设府置县。康熙年间,户部钞关由河西务移到北门外南运河畔甘露寺,驶抵天津的运河商船与闽粤、宁波海船,都要来此验关纳税。各种专业性的街道和市场,较前更为繁盛,很快与东门外“延续城市文脉”的老街官南、官北大街联片成区,形成一条“房屋林立,相连数里”的“环城通衢”,也就是天津城市的繁华区和商业中心。

由于天津是大运河北端唯一一座依河傍海的城市。海河上游五大支流,可通达华北各省或江南地区;自大沽口出海,可驶抵南北沿海各省,远达太平洋和印度洋,天然地沟通了天津与世界的联系。所以开埠后的九国租界设立,不但相互毗连,而且全部沿天津城外的海河走向进行划定。租界无疑是屈辱和痛苦的象征,但是对外开放的“窗口效应”带来了作为近代国家必不可少

开放之城 天津 包容五方 拥抱世界

罗澍伟

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到天津考察调研。今年2月1日,总书记来到天津古文化街,他说,天津是一座很有韵味和特色的城市。这是总书记对天津充满温暖和深意的一句评定。

天津城市的“韵味”和“特色”究竟在什么地方?我想,能不能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:天津是座开放之城,不但能够包容五方,而且可以拥抱世界。这样的“韵味”和“特色”,一直灵动并绽放在天津城市的过去与现在。

图片由天津津旅海河游船股份有限公司提供

少的世界先进文明和文化。天津城市也因具备通往大海、面向世界等开放性的地缘优势,发挥出引领近代文明的作用,城市规模和地位迅速增长,从传统的地域行政和经济中心,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工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大港。

文化创新发展与开放密不可分。一百多年来,伴随着城市的转型,天津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,这就是: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兼容并蓄,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交相辉映,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互鉴,从而使天津的地域文化彰显出与众不同的较高辨识度,以及较强的融通与和谐精神。

包容五方 文化背后的情感承载

天津城市素以“五方杂处”而闻名;在近代,又出现了“华洋杂处”的局面。

城市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集中,尤其是人口的集中。旧志记载,“天津向只七姓”。金元时期,天津作为漕运枢纽,得到繁荣,“一日粮船到直沽,吴甬越布满街衢”,直沽港也成为漕船聚泊、客商云集的重要港口。再加上作为军事建置的“寨”“镇”不断调兵戍守,人口开始聚集。因此当时的人口结构特点是“兵民杂居”,所谓“兵民杂居久,一半解吴歌”,也就是说,人口大半来自江浙一带。清代乾隆武举李提,世居南运河畔侯家后,曾自题门联:“天津卫八十三龄铁汉子,侯家后五百余载旧人家”。有人推算,上溯500余年,正值元代中叶,可见李氏家族就是元代迁徙这里定居的。

此后,天津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又出现了两

次,一次是在明代设卫之后,一次在清初设州、开府和置县期间。

明代天津三卫共有驻军16800人,一律世袭,并可携带家眷。日后如有减员,仍从原籍征调,“闽广万里,吴楚三千里,齐梁千里”,也在所不惜。

清代天津改为地方行政建置,盐漕两业兴盛,商业贸易发达,再加上政府的优惠招商政策,天津人口再次出现大规模聚集,军民商贸,杂沓而至,新增人口比明代增加了80%以上。“屈指版图,土著仅十之二犹歉”,以致城市中出现了“土著者少,流寓者多”“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”的状况。

天津开埠与辛亥革命之后,工商业空前发达,周边地区及邻近各省的农村人口加速向天津城市聚集,很快使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。

新鲜人口的不断涌入,使天津成为一个外来人口组成的城市社会,“外地人”聚集在一起,邻里间的人际关系发挥实际作用的潜意识,是彼此的认同、接纳、帮助与尊重,是温暖厚重的人文情怀,不会“欺生”,没有排斥。正是基于每个人的文化成长环境,几百年来,这种由传统感情携带的记忆,已经融化在天津人永久的血脉中。所以活在天津,会让人产生一种无拘无束、无牵无挂的松弛感。

天津开埠后,即便生活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下,城居者相互间也不会产生隔膜,而是各谋其生,各安其业,互不相扰。传统生活与现代意识平和共处,典雅文化与大众娱乐同时并存,一直是天津城市社会的主导。原住民的生活方式,即便受到外来影响也没有大的冲突,接纳与包容,在天津似乎成了一种习惯,并由习惯渐渐演

变为一种文化特质。

隔开足够的时光,我们会发现:因为开放,我们明白了什么叫作“坚守”;因为要走向世界,我们懂得了为什么要“不忘初心”。这也是天津的传统文化保存可以跨越时间长河,即便历经岁月冲刷,依然散发光泽、触动人心的根本原因。所以,从风土人情,到从日常生活;从年节习俗,到吃喝穿戴,天津始终保持着传承或遗留下来的地方特色。特别是传统节日期间,能够凸显出红红火火的“年节味儿、文化味儿、天津味儿”,在中国现代化的大城市中,确属独具一格。这是文化背后一种情感的承载,在很多情况下,一座城市的文化密码、文化面貌,就是在这些特有的基因中被编定的。

城市的气质,城市的精神和气概,还饱含着城居者对如歌年华或风雨岁月的回望与回味。

天津的风貌南北交融、古今并存,东西荟萃、欧风华韵——既充满了美丽、高贵的东方古典韵味,又可以看出跨越时空、典雅靓丽的“万国”人文景观。天津的“小洋楼”,能与北京的“四合院”比肩;街巷的“欧陆风情”,不输西洋本土建筑之美,处处彰显了这座城市文化多元的丰赡与精微。而且,这些可与历史对话、可与文化相遇,永不褪色的时光场域与独特的韵味,会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断加分、增值。

如今,“游海河古今美景,逛天津欧陆风情”这一多角度、多意向、打破时空维度的恣意与悠扬,已成为天津城市与广大游客穿越时空、聆听诉说的美丽邂逅。

这座以“包容五方”为特色文化品牌的城市,正在用特有的城市之美、文化之美,“兴旅”“兴业”,铸就自身的新辉煌。

拾遗

陶行知:循序渐进培养孩子

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对他的孩子们,从小就重视要动手劳动,不要做少爷、小姐,养成做人上人的毛病。他外出不在家写信时还要在信上叮嘱他的长子陶宏、次子陶晓光:“桃红、小桃在家,自己的事要自己干。衣服要学洗,破了要学缝。烧菜弄饭都要学。还要扫地抹桌。有益的事都要做。”

及长一些,陶行知就要求孩子们向自助助人的方向去做。陶行知觉得社会上对小孩的教育普遍只有两个阶段:一是全然依赖;二是忽然自立。这中间缺少明确渐进的桥梁。他在“儿子教学做之四个阶段”的诗里这样写道:

三餐喂得饱,个个喊宝宝。(一)
小事认真干,零用自己赚。(二)
全部衣食住,不靠别人助。(三)
自活有余力,帮助人自立。(四)
陶晓光13岁时,陶行知就教他一面自学,一面写小稿子投稿;一面学英文,一面编译小的科普文章,这都可以赚些零用钱。

侯宝林:妙答刁钻提问

1984年,侯宝林带中国曲艺说唱团赴美国访问。在美期间,美国记者提出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:“侯宝林先生,您知道,根里是演员,当选了美国总统,您也是演员,在中国也可以像草根这样参加竞选吗?”

侯宝林稍加思索,便回答道:“我和根里不一样,在好莱坞,他是二流演员。在中国,我是一流的。”侯宝林的回答既巧妙回避了问题的尖锐部分,又充分地表达了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自信,含而不露,令对方无懈可击。

历史随笔

下令诸卿出兵攻打赵氏,赵氏家族被满门抄斩,仅剩赵盾的孙子赵武,因跟在晋景公的妹妹赵庄姬的身边而幸免。

正直的韩厥感念昔日赵氏养育和知遇之恩,在“下官之难”需要选边站的时候,宁可违背国君命令,也始终不肯派兵攻赵。事后,他更是悲愤难平,冒死向景公进言说:“当年成、宣(赵衰、赵盾父子)对晋国有大功,却落了个无后的悲惨下场。如此,以后还有谁甘心为晋国建功效命呢?”晋景公听从韩厥的谏言,封年幼的赵武为赵氏继承人,返还赵氏的封地,这才使赵氏免于亡族。此后,韩厥将年幼孤苦的赵武抚养成人。赵武即为后世的赵文子,他续写了赵氏的辉煌,成就了战国赫赫有名的赵国。

公元前574年,执政大臣栾书发动政变,捉住并想杀晋厉公,但他担心背上弑君的罪名,便想拉拢韩厥。韩厥义正词严地回复说:“靠杀国君来树立权威,这种事情我可做不出来。当初赵氏被人诬告,我都能顶住压力不出兵向赵氏发难。古人有句话:杀死一头老牛尚且没有人敢做主,更何况你们今天竟敢要杀国君!你们要对国君不敬,那是你们的事情,哪里还用得着我!”面对韩厥的忠肝义胆,栾书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

晋悼公继位后,励精图治,想匡扶晋国的霸业,一心为国、忠勇正直的韩厥成为他的首选。公元前573年,韩厥被破格升任为执政大夫兼中军元帅,印证了赵盾42年前的预言:他日执晋政者,必此人也!后来三家分晋时,韩厥的儿子韩起(韩宣子)成为韩国的开创者,对于这个结果,史书说这是“厥之遗惠矣”。

《韩诗外传》里说:“正直者,顺道而行,顺理而言,公平无私,不为安肆志,不为危易行。”对于一个人来说,正直不一定让路走得平坦,但一定可以走得长远。韩厥所得到的结果,不得不说是对他一生正直品格的报偿。

正直的报偿

清风慕竹

韩厥出身于晋国公族世家,身世显赫,但到了他这一辈时已经家道中落,父亲早丧,而他尚且年幼,韩氏有了灭族之危。幸运的是,韩厥被仁慈宽厚的赵衰收留。赵衰是随同晋文公流亡的功臣之一,此时执掌朝政,正如日中天。赵衰对韩厥视如己出,让他跟自己的儿子赵盾一起学习、生活,这让韩厥得到了很好的教育,养成了正直、勇毅的品格。

赵衰去世后,年轻的赵盾接替父亲主政晋国,兼任执政大夫和中军元帅。公元前615年,秦国发兵攻打晋国,赵盾亲自领兵迎敌。出征前,他提拔韩厥为三军司马,这让所有人为之侧目。“司马”是一个官职,《周礼》里规定:“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……群吏听誓于陈前,牺牲以左右徧陈曰:不用命者斩之。”这就是说,凡是与军旗相关的赏罚,均由“司马”一手处置,“司马”相当于“军事法官”,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。在当时的晋国,司马的地位仅次于六卿,韩厥一出场,就位居这样的高位,人们心里都清楚,没有赵盾做靠山,这是不可能的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,韩厥的第一次出手,就让赵盾很没面子。

大军开赴前线,旌旗招展,军容齐整,不料一辆战车飞驰而来,在大道上横冲直撞,如入无人之境,吓得士兵们不得不赶紧躲避,原本整齐的队伍一下子混乱起来。这一幕恰巧被韩厥看到了,他二话不说,下令将战车拦截,并把驾车的人抓了起来。可等人们看清车和人之后,不禁目瞪口呆,原来战车是主帅赵盾的座驾,而驾车的人则是赵盾的御戎(驾驭军车的甲士),怪不得敢如此放肆。现在这个烫手的山芋到了韩厥手上,人们拭目以待,看他如何处置。韩厥想

拥抱世界

汇聚发展的创新火种

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,确切一点说,是近代历史文化名城。这类城市数量虽然不多,但开放早、规模大、成长迅速,在诸多方面代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、文化走向。

17世纪开始,西方国家在经历了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后,生产力突飞猛进,世界进入了近代化时代。近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相比较,表现出无可替代的优越性。

当我们重返时间的河流、解构逝去的过往时便会发现,在巨大的文明差距中,历史终会选择以先进取代落后,促使全球向先进的文明体系倾斜、集中。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,近代文明通过波涛汹涌的大洋,迅速涌入天津。

天津是首都北京的“护城河”,历史上的天津与北京,一直是“一损俱损”的特殊关系。在近代中国,天津遭受过众多的外来侵略。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重大历史事件,差不多都要通过海河来演绎,都要进入天津来彰显。在一定意义上说,天津城头的风云变幻,海河两岸的潮起潮落,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。

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保守的民族,源远流长、底蕴丰厚的中国传统文明,门庭广大,有着海纳百川的品格。拥抱世界,是为了汲取、为了借鉴,进而激发自身的力量,点燃创新发展的火焰。

所以与首都联系最为紧密的天津,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吸纳近代先进文明的窗口、跳板和制高点,各种大规模的“洋务”设施和“新政”举措,率先在天津兴起,“国家维新之大计,肇画经营,尤多发轫于是邦(指天津),然后渐及于各省”。举凡“将校之训练、巡警之编制、司法之改良、教育之普及,皆创自直隶,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”,因此,天津“区区虽为一隅,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”。

驻节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手握军政和外交大权,为朝廷所倚重,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,天津一度是中国的政治重心所在。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,近代以来“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,外交之利害,全国之安危,而恒于是乎卜之,故往往动中外人之视听”。

尽管近代中国向先进迈进总是步履维艰,却因此触发了传统天津蕴含的经济火花,迅速点燃了近代天津的成长之火。在沉寂中积蓄了几百年的内生力量,也因为世界文明的到来,脉动出全新的发展活力,促使天津迅速成长为中国北方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城市 and 贸易大港。

及至近代,天津城市率先融入世界、拥抱世界,与时代一脉相连,引领了近代先进文明和先进生产力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,打造出一个能够应对变局的特有平台,托起了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,承载了一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非凡历史,彰显了一种集开放、包容、多元、融通和创新于一体的独特城市成长模式。我想,这也正是天津城市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,按下城市发展的“快进键”,涌现出诸多“中国第一”,实现了历史辉煌的原因所在。

古往今来,面对“逝者如斯”的河川,面对广阔无垠的海洋,天津,始终是播撒希望的热土,是成功者的始发港湾。

新时代新征程,如何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,立足自身禀赋,展现天津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,传承发展天津城市文化,培育滋养城市文明,让天津城市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,展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,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。

(作者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,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、研究员)

三国:不是“魏蜀吴”

人们通常认为三国只有魏、蜀、吴三个政权,或者称为曹魏、蜀汉和孙吴,其实这些都不对。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,定都洛阳,国号确实是“魏”,史称曹魏,标志着三国历史阶段的开启。221年刘备称帝,定都成都,国号却不是“蜀”,而是“汉”。229年孙权称帝,定都建业,国号“吴”。所以真正的三国应该是魏、汉、吴。魏、蜀、吴的称呼多因《三国志》所起,《三国志》由《魏书》《蜀书》《吴书》构成,给人以错觉,认为刘备建立的政权是“蜀”。

其实,刘备称帝时在祭天文告里说得很明确,他建立的朝廷是刘汉王朝的延续,国号仍然是“汉”,所以刘备当皇帝不称登基而称继位。对其他两方来说,在当时也不存在一个“蜀国”:曹魏认为自己是合法政权,自然不承认“蜀国”的存在,提到时多称其为“贼”;孙吴与刘备政权结盟,双方举行过正式盟誓,提到刘备政权时通常称其为“汉国”。

《三国志》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,他之所以不承认“汉国”,是因为晋朝由曹魏禅让而来,而曹魏又由东汉禅让而来,所以晋朝立国的前提是汉朝已经于曹魏政权建立时结束,因此,对于刘备“承汉祚”的说法,陈寿自然不予认可。

萨维奇:把“命”送给医生

18世纪英国作家理查德·萨维奇为了维持生计,写了一本有关自己生平的传记,希望能够赚些钱来改善生活。可没想到,公众对他根本不感兴趣。由于缺吃少穿,萨维奇最终病倒了,幸好给他治病的医生医术非常高明,经过治疗,萨维奇转危为安。

可是,这名医生是“吸血鬼”,不管病人家境如何,都要收取高额的诊费。他对萨维奇说:“你欠我一条命,你要有所报答。”萨维奇听了,平静地说:“为了报答您,我把我的命送给您。”说完给医生递了本自传。